

从简帛文献看汉语量词系统建立的时代

李建平 张显成

摘要: 关于汉语量词系统建立的时代,从传世文献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魏晋南北朝,甚至晚至宋元之际。今从简帛文献来看,两汉时期汉语量词系统就已经建立起来了:类系齐备,数量丰富,分工细密;使用频率高,使用量词在数量表示法中开始占据优势地位;语法化进一步发展,泛指量词广泛使用,“数+量+名”结构产生;语法功能进一步拓展,词缀式、“名+量”式构词方式都已产生。

关键词: 简帛文献;量词;语法化

中图分类号: H121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9-1017(2011)01-0073-05

量词丰富是汉藏语系诸语言的一大特色,但量词系统并非先有的,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语法化过程。汉语量词系统建立的时代及其动因,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。但正如刘世儒先生所言:“汉语量词,历史悠久,材料浩繁……只有把量词的各个历史横断面都研究好了,汉语的整套的系统的量词史才有可能建立起来。”^①量词的断代研究,刘先生导夫先路,对魏晋南北朝量词进行了系统考察,但目前量词断代研究做的还很不够,对于量词起源的动因、量词系统建立的时代、“数+量+名”结构的来源等诸多问题仍聚讼纷纭。

一、量词系统建立的判定标准

对于汉语量词系统建立的时代问题,主要有两种观点: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,刘世儒先生对魏晋南北朝量词进行了断代研究,提出这一时期量词体系完备,标志着汉语量词系统的正式建立。郭锡良先生也认为:“汉代以后,数+(量)+名的结构开始产生。但是汉代数词一般还是直接与名词结合……

魏晋以后,单位词才完成了分化的过程,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量词范畴。”^②二是宋元时期,石毓智认为“汉语的个体量词,萌芽于两汉,产生于魏晋,稳步发展于唐宋,牢固建立于宋元之际”。^③即宋元之际,“数+量+名”结构在语言中占据了优势,标志着量词范畴的最后确立。

传世文献的量词研究往往强调“数+量+名”结构在量词发展中的地位,如王力先生说:“这是很重要的转变,可以说是一种飞跃……因为当数词和单位词放在普通名词后面的时候,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够密切的;后来单位词移到了名词前面,它和名词的关系就密切起来,渐渐成为一种语法范畴。”^④

“魏晋六朝说”和“宋元说”都以此为标准来判断量词系统建立的时代,我们认为这一结构的产生诚然在量词语法化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,但并不是量词范畴建立的唯一标准:首先,早在战国楚简中这一结构就出现了,达到64例之多,但先秦显然只是量词的萌芽期;^⑤其次,当汉代簿籍类文献中量词使用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时,数词不再与名词直接结合,而是要同量词组成数量结构才能充当句子成分,即“名+数+量”结构在称数样式中占据了优势地位,而“数+量+名”结构仍很罕见;再次,从其它量词

①刘世儒《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65年,第3页。

收稿日期:2010-07-03

基金项目:国家社会科学基金《简帛量词研究》(05BYY003)。

作者简介:李建平(1980—),山东东营人,西南大学文献所博士生,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,主要从事简帛语言文字研究。

张显成(1953—),四川成都人,西南大学文献所教授,博士生导师,主要从事简帛语言文字研究。

②郭锡良《从单位名词到量词》,载《汉语史论集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6年,第38页。

③石毓智《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》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6年,第196页。

④王力《汉语史稿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0年,第240页。

⑤李建平《战国楚简中的量词及其语法化》,载《简帛语言文字研究》第三辑,成都:巴蜀书社,2008年,第42页。

语言来看,藏缅语族中的彝语支、缅语支、羌语支和克伦语支量词都比较丰富,但却采用“名+数+量”语序,显然不能因为这些语言中没有“数+量+名”结构而否认其量词范畴的存在。

因此,我们认为“数+量+名”结构的产生与发展是判断汉语量词范畴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,但并不是唯一标准,还应当综合考察量词内部类系的发展、量词数量的扩张(尤其是个体量词数量的扩张)、量词在数量表示法中的使用频率、量词的语法功能、量词的语法化程度等各个方面。尤其是当使用量词在数量表示法中占据优势,数词在计数时不再和名词直接结合,而是首先和量词组成数量结构共同充当句子成分时,即使量词没有出现在“数+量+名”结构之中,其语义及语法功能和名词无疑有了明显的区别,量词范畴就已经建立起来。

二、从简帛文献看汉代量词的发展

简帛文献的出土,尤其是大量遣策类、簿籍类等文献的出土,为汉语量词史研究提供了大量宝贵的“同时资料”或“准同时资料”,^①我们对已公布的78种出土先秦两汉魏晋简帛文献中的量词系统做了穷尽性的整理研究,认为两汉时期汉语量词范畴已经建立起来,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。

(一) 量词部类发展完备,数量丰富。

1. 动量词已经产生,量词两大类系齐备。从传世文献来看,对于先秦动量词傅铭第先生举出“周”、“匝”两个,^②但仍可视为名量词;杨伯峻、何乐士二先生又举出“巡”、“成”2个,^③但仍可视为动量词。确切无疑的动量词先秦未见,即使到西汉也仍然罕见;^④但从简帛文献看,动量词萌芽于先秦,两汉获得了发展。

从出土文献看,秦简有“步”、“课”两个动量词。“步”凡6例,如《周家台秦简》326:“见东陈垣,禹步三步。”又332:“见车,禹步三步。”禹步,是古代巫师作法时的一种行步方法,《玉函秘典》:“禹步法,闭气先前左足,次前右足,以左足并右

足,为三步也。”“步”强调的并非距离,而是动作,“禹步三步”意为“禹步三次”;可见“步”为动量词无疑。“课”仅1例,睡虎地秦简《秦律十八种》19:“今课县、都官公服牛各一课。”课,即考核;一课,即考核一次。二者均从动词义借用而来,即“同源动量”。

两汉简帛中动量词获得了初步发展,有“通”、“发”、“辈”、“伐”、“下”、“周”、“反”7个,如:

(1) 出堠二苴火一通。(居延汉简486.49)

(2) 第八隧攻侯障君,与主官谭等格射各十余发。(居延汉简EPF16.47)

(3) 斂主新黔首籍,三辈战北,皆并居中一笥中,未有以别智(知)当捕者。(张家山汉简·奏谏书140)

(4) 铍即磔治(答)讲北(背)可十余伐。(张家山汉简·奏谏书107)

(5) 敞辞曰:初欲言,候击敞数十下,胁痛,不耐言。(居延汉简123.58)

(6) 画地三周,宿其中。(居延新简EPT59.137)

(7) 三人负麻,人反十八束,反复卅里。人再反,六十里。(敦煌汉简1650)

其中,动量词“通”在汉代使用频率已经很高,如《居延汉简》24例,《居延新简》6例,《敦煌汉简》10例。“下”和“伐”均是称量“打击”义动词的,二者很快合流。“通”、“发”、“辈”、“下”、“周”、“反”6个,均沿用到魏晋六朝以后。

2. 量词数量丰富。甲骨文量词不到10个,^⑤金文发展到40多个。^⑥先秦简帛文献中量词79个,其中个体量词仅25个;《左传》量词60个,但多度量衡和编制单位,个体量词仅12个;^⑦《战国策》量词39个,个体量词仅7个,均为物量词;《论衡》中量词43个,个体量词仅16个。而两汉简帛文献中,物量词总数达到130个,其中自然单位量词69个,而语法化程度最高的个体量词则达到46个之多;^⑧简帛量词使用如此广泛,应当与简帛文献多账

①太田辰夫《中国语历史文法》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87年,第81页。

②傅铭第《关于动量词“匝”和“周”》,《中国语文》1965年第1期,第27页。

③杨伯峻、何乐士《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》,北京:语文出版社,1992年,第204页。

④杨剑桥《汉语动量词不产生于先秦说》,《语言研究》2009年第4期,第22页。

⑤李若晖《殷代量词初探》,《古汉语研究》2000年第2期,第79页。

⑥黄载君《从甲文、金文量词的应用,考察汉语量词的起源与发展》,《中国语文》1964年第6期,第432页。

⑦何乐士《〈左传〉的数量词》,载《古汉语语法研究论文集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0年,第343页。

⑧李建平、张显成《先秦两汉魏晋简帛量词析论》,《中华文化论坛》2009年第4期,第69页。

簿、遣策类文献，从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数量表示法之面貌有关。

表一：两汉简帛物量词总表

个体量词	46	枚、个、乘 ₁ 、两 ₁ （辆）、艘、口、头、匹 ₁ 、骑、所、处、区、领、衣、裁、编、篇、章、卷、牒、等、级、石 ₁ 、条、獮、发、节、成、颗、丸、梃、人、辈、封、通、合 ₁ 、张、物、事、本、岁、算、只、件、种、函
集体量词	23	乘 ₂ 、两 ₂ 、双、偶、纯、把、束、絮、槩、具、堵、积、聃、齐（剂）、分 ₁ 、撮、三指撮、户、家、室、术、稷、升
借用量词	27	筓、篮、答（落）、筓、篋、篋、笼、筭、桮、杯、棹、枳、资、塤、埕、罍、刀圭、刀、匕、方寸匕、器、盛、鼎、孟、囊、橐、车
度量衡量词	34	分 ₂ 、寸、尺、丈、寻、匹 ₂ 、幅、步、里、围、石 ₂ 、斛、斗、参、升、合 ₂ 、龠、眷、石 ₃ 、钧、斤、两、铢、分 ₃ 、顷、亩、石 ₄ 、畦、步、版、钱、布、金、分 ₄

3. 量词的分工进一步发展。量词语法化的初期总是有很多兼职，随着量词的日趋丰富，其分工也逐渐明晰，到两汉简帛中量词的分工已经相当细密，如就物体而言，粒状或圆形物一般用“颗”，药物则用“丸”，条形物则用“梃”；就交通工具而言，船用“艘”，车用“两”或“乘”，而“乘”多量“马车”，“两”多量“牛车”，也有分工的趋势；就有生之物而言，人用“口”，鱼、牛、羊用“头”，马用“匹”，一人一马则用“骑”。例不赘举。

（二）使用频率高，使用量词在称数法中占据优势地位。

刘世儒先生认为：“在上古数名组合须要通过量词介绍这一规范还没有形成（两汉）或者根本就不存在（先秦）。"^① 而从简帛文献来看，这一规范其实始于先秦，形成于两汉。

从先秦简帛看，27 种文献中物量表示法总计 2337 例，使用量词的 718 例，占 30.7%。从传世两汉文献看，量词的使用频率仍不高，我们统计了《礼

记》、《论衡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穀梁传》、《盐铁论》五种文献，其中物量表示法凡 2070 例，使用量词 448 例，仅占 21.6%。但从两汉简帛看，我们选取成书时代明确的 24 种汉简中的物量表示法进行了全面统计：^②

表二：汉简物量表示法统计表

称数样式	频率	总计	比例
数+名	231	798	46.4%
名+数	484		
数词单用	83		
数+量	130	921	53.6%
名+数+量	777		
数+量+名	9		
量词单用	5		
总计	1719	1719	100%

量词的使用占物量表示法的 53.6%。《居延汉简》物量表示法总计 4280 例，使用量词的达到 2746 例，占 64.2%。^③ 尤其在准确计量的遣策类文献中，量词的使用更是必不可少，如汉初的马王堆 3 号墓遣策，数量结构总计 524 例，“名+数+量”结构 314 例，占 59.9%；凤凰山 167 号墓遣策称数结构 81 例，“名+数+量”结构 71 例，占 87.7%。由于书面语言的滞后性，可以推测当时口语中量词的使用频率应当更高。如此高的使用频率，无论是先秦还是两汉，都是传世文献量词研究所未知的。可见，使用量词在汉代无疑已经开始成为一种规范。

（三）量词语法化的发展。

1. 泛指量词的成熟。泛指量词是量词系统中最为特殊的一类，其源词义几乎完全消失，语法化程度最高，汉语史上泛指量词有“枚”、“个”两个。从传世文献看，“枚”在《史记》、《春秋繁露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说苑》、《新书》、《新序》、《盐铁论》、《法言》、《新语》9 种西汉文献中仅 6 例，而西汉简帛

①刘世儒《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》，第 32 页。

②24 种汉简为：焦山汉简、萧家草场简、未央宫汉简、清水沟汉简、高台汉牍、古人堤汉简、甘谷汉简、邗江汉简、平山汉牍、花果山汉简、海州汉牍、胥浦汉简、东牌楼汉简、罗泊湾汉简、大坟头汉简、孙家寨汉简、孔家坡汉简、凤凰山 8 号墓汉简、凤凰山 9 号墓汉简、凤凰山 10 号墓汉简、凤凰山 168 号墓汉简、凤凰山 167 号墓汉简、凤凰山 169 号墓汉简、马王堆 3 号墓汉简。
③陈近朱《〈居延汉简〉中物量词和称数法探析》，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，2004 年通过，第 40 页。

则很常见,仅写成于文帝至景帝的《凤凰山 167 号墓简》中即有 37 例之多,而《凤凰山 8 号墓简》中则可以称量有生之物“鱼”等。时代稍后的《居延汉简》(包括《新简》)179 例,《敦煌汉简》15 例,《敦煌悬泉汉简释粹》21 例,其适用范围非常广泛,可以自由应用于无生、有生之物,无生之物包括各种器皿、席子、皮革、木制品、钱币、兵器、衣物、封签、绳索等等,有生之物既包括树木等植物,也包括狗、鸡、鱼等动物。无生之物用例传世文献常见,此不赘列;有生之物用例如:

(8)不移转牛凡三百廿九枚,见二百枚不付。(敦煌汉简 1168)

(9)出鱼卅枚。(居延汉简 274.26A)

(10)入狗一枚。(同上 5.12)

(11)出鸡一枚,以食使者王君,一食,东。(悬泉汉简 121)

可见,泛指量词“枚”在汉初已广泛应用,汉代中期臻于成熟,到汉末三国时期的吴高荣墓《遣策》木牍(写成时代在公元 232-238 年之间)中,所计量事物几乎全部用量词“枚”来称量:

(12)故练祿一枚;故绢祿一枚;故绢祿一枚;故练祿一枚;故练祿一枚;故练緌裙一枚;故绢緌裸一枚;故练两裆一枚;故练单裸一枚。故绢单裸一枚;故半緌緌缚一枚;故半緌緌缚一枚;故练緌缚一枚;故练緌缚一枚;故练小缚一枚;故练緌祿二枚。(正面)

该木牍 79 个称数结构中,使用量词“枚”达到了 75 例之多,占总数的 95%。量词系统中语法化程度最高的泛指量词的成熟,也说明了当时量词系统的发达程度。^①

2. “数+量+名”结构的产生。“当数词和单位词放在普通名词后面的时候,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够密切的;后来单位词移到了名词前面,它和名词的关系就密切起来,渐渐成为一种语法范畴。”^②传世先秦文献“数+量+名”结构罕见,尤其自然量词的用例,贝罗贝等认为这一结构是晚至汉代才出现的。^③从先秦简帛看,“数+量+名”结构已较多见,而且

其发展体现出了强烈的地域性。楚简帛凡 64 例:度量衡量词 1 例,借用量词 7 例,个体量词 46 例,集体量词 10 例。如:

(13)三匹驹骝。(曾侯乙墓简 148)

(14)一格车戟。(包山楚简 269)

(15)二真楚甲,素。(曾侯乙墓简 122)

(16)阳城君三路车,鄴君一乘,旅公三乘路车。(曾侯乙墓简 119)

(17)一两缘鞶屨;一两丝屨;一两鄴緌屨;一两緌屨;一两緌屨。(信阳楚简·遣策 2)

数量结构作定语有时候可以加“之”,如上博简《容成氏》44:“是乎作为九成之台。”楚简帛此类结构多见于遣策类文献,而时代稍晚的秦简中却仅 2 例,且均为度量衡量词。两汉简帛也很少见,且限于度量衡和借用量词,所调查的 24 种汉简中仅 9 例,均为度量衡量词,这可能与楚简帛多簿籍类文献有关。两汉时期,“数+量+名”结构在数量表示法中虽然比例还很小,但在大量文献中,其总数已经很多,正如潘允中所言:“在汉代的文学语言里,已经把这种语法形式巩固下来,无论自然单位的量词也好,度量衡的量词也好,都已经直接接在名词的前面了。”^④如:

(18)乌孙以千匹马聘汉女。(史记·大宛传)

(19)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马。(同上)

(20)母见其上若一匹练状。(论衡·吉验)

(四)量词的语法功能进一步拓展。

1. 词缀化构词法的形成。“名+量”构成新词,量词失去了表量功能,成为词缀,王力先生认为:“这种结构是相当后起的……直到宋元时代,单位词才用作词尾。”^⑤刘世儒认为产生于南北朝:“在这个时代以前,这种构词法一般说还没有形成。偶然出现几个零星的例子,也只能说还是一种‘萌芽’,因为数量太少,又多有问题,还不能形成一种范畴。”^⑥但从两汉简帛来看,“名+量”结构的双音词已经产生,而且数量也很不少,例如:

(21)告尉谓第廿三候长建国受转谷到,言车两石斗数。(居延汉简 145.2)

(22)仓谷车两名籍。(居延新简 EPT52.548)

①以上可详:李建平、张显成《汉语泛指性量词“枚/个”的兴替及其动因》,《古汉语研究》2009 年第 4 期,第 64 页。

②王力《汉语史稿》,第 240 页。

③贝罗贝《上古、中古汉语量词的历史发展》,载《语言学

论丛》第 21 辑,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98 年,第 108 页。

④潘允中《汉语语法史概要》,郑州:中州书画社,1982 年,第 119 页。

⑤王力《汉语史稿》,第 244 页。

⑥刘世儒《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》,第 16 页。

(23) 阳朔二年正月尽十二月吏病及视事书卷。
(居延汉简 8.1A)

(24) 建武柰年四月以来,府往来书卷。(居延新简 EPT22.409)

“两(辆)”、“卷”用作量词在两汉简帛已很普遍,因此在这一时代“车两(辆)”、“书卷”为双音复合词是毫无疑问的。从文意及所处的语法位置来看,也无疑义。

2. 偏正式复合词“量+名”构词方式的产生。刘世儒认为:“到了南北朝才更通行起来。”^①其实在《睡虎地秦简》中就已经很常见,例如:

(25) 雨为澍,及诱(秀)粟,辄以书言澍稼、诱(秀)粟及猥(垦)田暘毋(无)稼者顷数。稼已生后而雨,亦辄言雨少多,所利顷数。早(旱)及暴风雨、水潦、螽、群它物伤稼者,亦辄言其顷数。(秦律十八种 1-2)

(26) 禾粟虽败而尚可食馱,程之,以其中耗石数论负之。(效律 24)

“顷数”、“石数”为“量+名”式复合词无疑,到了汉简就非常普遍了,如:

(27) 直(置)所得米升数以为法,有(又)值(置)一石米粟升数而以耗(耗)米升数乘之【以为实】,如法得一升。(张家山汉简·算数书 49)

(28) 亦以一尺寸数为法,以所得寸数乘一尺贾钱数为实,实如法得一钱。(同上 63)

仅《算数书》中“量+名”偏正式名词就甚多,如“步数”达 12 例,“钱数”8 例,“升数”5 例,说明“量+名”构词形式在两汉已经发展成熟。

3. 组合能力的发展。量词一般同数词组合共同充当句子成分,古今皆然。两汉时代量词已经可以同疑问代词、形容词等其他词类组合,例如:

(29) 今织有攻(功)五十尺,问各受几何尺。

(张家山汉简·算术书 54)

(30) 今误券三斗一升,问几何步一斗。(同上 68)

(31) 取弱(溺)五斗,以煮青蒿大把二、鲋(鲫)鱼如手者七,冶桂六寸。(马王堆帛书·五十二病方 248)

量词单独使用时,刘世儒提出在魏晋南北朝可以充当定语、主语、状语三种句法成分,实际上早在秦简中就已常见,两汉简帛更获得了进一步发展。仅以《睡虎地秦简》为例:

(32) 赐田嗇夫壶酒束脯。(秦律十八种 13)

(33) 顷入刍三石、蒿二石。(同上 8)

(34) 其以牛田,牛减絜,治(答)主者寸十。
(同上 14)

三、小 结

从出土简帛文献来看,两汉时代量词系统已经建立起来,体系完备,数量丰富,分工较为细密,尤其是数量表示法中量词观念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,数词一般先同量词组合为数量短语才能共同充当句子成分;量词的各类语法功能均已经产生,只是在初期使用频率较低,但在语法功能上已经和源名词或动词有了很大差别;语法化程度最高的泛指性量词“枚”获得了广泛而高频率的使用,语法化程度很低的拷贝型量词则已经消失,量词的语法化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。

汉语量词系统发展的框架在两汉已经构建起来,魏晋以后量词在这一框架中进一步充实、发展,直到宋元之际“数+量+名”结构占据绝对优势地位,量词系统臻于完善,才同现代汉语没有太多差别了。

(责任编辑:陈剑)

^①刘世儒《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》,第 17 页。